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岳亮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工作就没有基础。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还作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郑重地向全党倡议“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指导下，紧随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号召“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他抓住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这两个主要问题，派出3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的农村，以10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情况最坏的生产队，直接向他汇报。不久，毛泽东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的心情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调查。南下途中，毛泽东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七省委和3位秘书的汇报。

制定完善“农业六十条”

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省的初步调查，严峻的形势让毛泽东感到需要搞个条例，把急需解决的问题固定下来。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条例规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三级所有制，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社员生活资料不得侵犯，等等。“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出台解决了一批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性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还存在不足，仍然主张坚持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广州会议后，政治局常委率先垂范，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蹲点调查44天，他不住宾馆招待所，自带草席被褥，把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设在了生产队的养猪场。调查的结果让刘少奇感慨万千，沉痛地说应当把因政策错误导致的损失刻碑警示以后再不犯错误。在河北武安县，周恩来召集群众的征求意见会上实际上开展了社员的诉苦大会。他向社员们道歉工作没有做好，总理没有当好。在四川、河南，朱德发现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而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农村浮肿病不到一个月就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在上海青浦县，陈云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饭还是吃粥”，他提出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这样可以多得几个口粮。在北京，邓小平和彭真率5个工作组进驻顺义、怀柔。发现问题严重的邓小平向群众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吃不吃食堂由群众自己决定。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各省、自治区第一书记也都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此全党上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全党近两个月的深入农村调查，充分掌握了民心思意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重要修改，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两个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得以彻底解决。“农业六十条”在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了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错误，解决了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是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了解到农业农村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觉，从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自1961年起，我国农业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年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

在集中力量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将调查研究贯穿1961年全年，先后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条例。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不合实际的错误政策，对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效果，国民经济终于从最困难中走了出来。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

为“人民的新湘西”奠定根基——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碑文敬读

□ 毛文君

1951年竣工的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碑，矗立在湖南省沅陵县胜利公园内。为纪念剿匪斗争胜利、缅怀英勇牺牲的千余名烈士，湘西人民和湘西行署于1950年12月决定将原中山公园改名为胜利公园，并修建纪念碑。纪念碑呈正方锥形，高16.96米，塔顶缀一红星，塔上方正面刻着“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碑”9个大字。下方塔台屹立一尊威武雄壮、手持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全身塑像，下嵌铜刻碑文。全文如下：

我湘西与鄂、川、黔、桂四省毗邻，武陵、雪峰两大山脉，横贯全境，交通不便，地瘠民贫，封建势力，极为雄厚。恶霸、地主、匪特，三位一体，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以武力、地租和大烟，对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残酷的压迫与血腥的统治，造成了湘西历史上数百年来的严重匪患。加之在蒋匪的纵匪害民政策下，更助长了匪特恶霸之凶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使我湘西广大人民饱受灾难，苦不堪言。当全国人民庆祝大陆解放之际，而国民党匪帮，仍企图以湘西之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做为其“反共游击基地”，派遣和组织匪特，大肆活动，妄想三次世界大战，待援复辟，欲陷我湘西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发展，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经苦战东北，转战华北、江南，继又入川作战，解放重庆。历尽千辛万苦，复于一九四九年冬，奉命进入湘西，执行毛主席关于“战斗队和工作队”的指示，担任肃清湘西匪、发动群众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为拯救我湘西三百五十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全体指战员在党和上级与湘西区党委及湘西军区的正确指导下，以自我牺牲的英勇行动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积极剿匪，无山不上，无村不搜，雨淋日晒，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日以继夜，忍饥挨饿，习以为常。经年余艰苦剿匪，全

歼土匪八万有余，解放湘西二十二县，创造了湘西历史上未有的奇迹，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一年多来，全军上下，无论在任何艰苦环境中，更高度的发扬了拥政爱民的精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作，生产救灾，减租反霸，实行土改，建立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使我湘西人民，获得彻底翻身，从此奠定人民的新湘西万年根基。

当我湘西人民热烈庆祝剿匪胜利之今日，饮水思源，为对剿匪有功的四十七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纪念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特建此剿匪胜利纪念碑，以流芳百世，永垂千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湘西行政公署及湘西全体人民敬立
公元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

碑文深情记载了湘西剿匪的经过，洋溢着湘西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感激和对牺牲烈士的怀念之情。

不消灭土匪一切工作都难开展

湘西毗邻鄂川黔桂四省，下辖22县，占湖南全省面积的1/4，人口350万，是解放军经中南进军大西南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重要。境内峰峦起伏，洞穴密布，是全国闻名的匪患重灾区。民间流传：“湘西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大肆招抚10余万湘西土匪武装，妄图依托湘西扼险固守，阻止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实现“把湘西打造成反共复国基地”的梦想。

湖南省委、湖南省军区将肃清土匪特务列为全省中心任务之一。时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指出，“上十万的匪特武装如不彻底干

净的消灭，则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必须尽早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制掉这根政治“盲肠”。

受命进驻湘西、经营湘西的第47军是东北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1949年10月，第47军攻克大庸、桑植，打开了进军西南的通道。1950年1月底，第47军主力结束入川作战返回湘西，未作休整，即全力投入剿匪斗争。

把湘西这个土匪窝打扫得干干净净

1950年2月1日，湘西军区发布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动员起来，为全歼湘西土匪而战，为人民解除痛苦，为我军争取新的荣誉，为建设新的湘西而战!!”由此开始历时一年多的湘西剿匪作战。

在湖南省委、湖南省军区的正确领导下，第47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由内向外，集中力量重点进剿匪情严重的地区。各部队包干分工，对土匪一块块地吃，吃一块就吃光，剿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吃另一块。第47军还组织追剿队和捕捉队，追剿流窜股匪、捕捉潜伏匪首，涌现出剿匪英雄丛士林、“长追千里连”等英雄集体和战斗功臣。到9月上旬，彻底肃清了中心区和夹生区的股匪，掌握了剿匪斗争的主动权。10月中旬，剿匪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在纵横400余公里的鄂川黔桂湘5省接壤区打响边缘区会剿战役。第47军指战员会同邻省部队无山不上、无洞不入、无沟不进、无处不搜，彻底荡涤匪巢。

第47军除了打仗消灭土匪外，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李大钊眼中的“赤色”

□ 王善英

年至1924年间，李大钊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这期间，李大钊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与把握，逐渐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断在中国大地上撒播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点燃马克思主义的火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请问这个赤色，是什么东西染成的？”李大钊在系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倡导和推动“赤色”革命，并深刻思考革命的路径问题。一方面，李大钊热情讴歌并欢迎迎接“赤色”革命。另一方面，李大钊深刻揭露当时军阀混战的黑暗统治和反动本质，批判黑暗的军阀统治进行的白色革命将中国变成了灰色，并担心他们会继续将中国变成黑色。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进一步揭露了反动军阀对新文化、新思想及赤色革命的恐惧、抵制与扼杀，“赤色”成为当时各种军阀、财阀等反动势力眼中的危险颜色和绞杀的目标。

在革命过程中，李大钊逐渐意识到“赤色”革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来熏染和浇灌的。1919年10月12日《新生活》第8期，李大钊发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深刻指出了革命牺牲的不可避免性，认为人道、真理、自由、平等、共和都需要持之以恒的奋斗和不断牺牲，平等、自由、幸福的赤色世界更需要用革命者的鲜血和牺牲来浸染和培植。“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他的美善，才

真能为我们所享受，所获得。爱的法则，即是牺牲的法则”，这是李大钊对自己“请问这个赤色，是什么东西染成的”最精准的回答。李大钊不仅对赤色革命的艰巨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更深切地体会到革命的残酷性，并做好了随时为革命奉献牺牲的思想准备。

“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随着革命的深入，李大钊逐渐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带领人民进行革命的“赤党”。真正的“赤党”是内外统一、里外都红的党，是一颗红心随时准备为革命奉献牺牲的党，而不是“外面挂着一层红皮，里面却是白的”的“红萝卜党”。李大钊用“红萝卜党”来比喻当时中国境内受帝国主义扶植却打着革命旗号的反动军阀等伪赤党。为此，1920年秋，李大钊领导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李大钊再次呼吁要建设一个像俄罗斯共产党一样的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团体，带领民众进行社会改革和革命，从而建设一个赤色的国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有了领导者和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积极推动中国赤色革命事业发展。他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区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他在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国民革命、促成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建



还发挥工作队的职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建立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在湘西扎下自己的根，铲除土匪的根。饱受土匪蹂躏的湘西人民真切感受到共产党是救星、解放军是靠山，积极帮助部队剿匪，形成军民合作的局面，村村驻兵、路路有哨，让土匪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12月底，湘西境内20人以上的股匪全被消灭，匪患基本肃清。1951年1月13日，《人民日报》以《湘西的历史面貌改变了》为题，盛赞湘西剿匪斗争取得历史性胜利。

湘西剿匪斗争是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湘西剿匪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大西南的顺利解放。英雄的第47军以“不消灭湘西土匪不收兵”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共歼灭近10万湘西土匪，打破了“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神话，彻底根除了湘西匪患，使350万湘西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奠定了人民新湘西的万年根基。

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卓越贡献，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1924年6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李大钊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因此有机会在莫斯科参观访问，领略了莫斯科的赤色世界。李大钊从莫斯科寄给国内记者的通讯中有大量关于莫斯科赤色见闻的描述，他看到莫斯科这个“赤色的都城”，看到俄国共产党的旗帜如“一幅华美的赤旗临风飘扬”，看到俄国共产党的少年组织队伍“红十月”，看到“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等标注赤色印记的各种事物和场所。莫斯科之行让李大钊对赤色的国家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对中国革命充满豪情壮志和殷切期望。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白色恐怖政策的实施，李大钊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中国的赤色革命需要举起自己的赤色旗帜，建立自己的赤色军队、赤色政府和赤色政权。然而遗憾的是，革命尚未成功，李大钊却于1927年4月28日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英勇就义，时年38岁。李大钊在赞扬俄国革命精神时曾指出，俄国大革命的精神不仅仅代表俄国的精神，而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对自由的追求，而“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李大钊最终为了这人类自由的精神、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一片赤子之心和宝贵的生命，用鲜血浇灌了那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而绽放的自由之花。